

“中美关系史中的人物”学术讨论会综述

刘辉

2005年5月19~21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四川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中美关系史中的人物”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60多位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讨论活动,提交论文30余篇。

与会者对给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及其作用进行了研讨。这次研讨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研讨范围广,论文涉及人物覆盖了中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诸方面。二是会议参加者大多比较年轻,显示了中美关系史研究队伍良好的发展现状。三是文章质量较高,会议的论文多出自年轻学者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经过精心修改,反映了年轻学者正在提高的学术水平。

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议题展开讨论:

(一) 政治家与中美关系

中美政治家对两国关系的作用历来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多年来有关研究成果已大量问世。此次讨论会上,关于政治人物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研究仍是会议重点,共提交论文12篇。其中,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美国的政治家尼克松、基辛格、里根、卡特、肯尼迪、腊斯克、谢伟思的研究文章9篇,占据了政治家与中美关系研究内容的绝大部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所提交的论文中,对人物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内容与特点。

首先,方法有所创新,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研究角度更为多元化。学者们较为熟练地在历史研究领域引入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中美关系中具有影响的政治家进行了历史学、政治学综合分析,比较有说服力地对原有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商榷。例如,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所提交《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一文,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美国1949年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神话所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美国根本没有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证明了关于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是灵活的现实主义者“失去的机会”的观点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与逻辑之上的。

此外,研究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国会、媒体、各利益集团对行政部门的影响日益扩大,一批中美关系中地位特殊却不可或缺的现实政治人物——国会议员被纳入了研究范围。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王玉兰的《南希·佩洛西:一位反华政策的制定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李才义的《罗伯特·卡根与中国威胁论》两篇文章均从政策过程分析、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关系等不同角度对国会议员在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其次,开辟了政治人物研究的新领域。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家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开始



有了新突破。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难点，同时，也意味着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在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在《邓小平与中美关系》一文中提出：邓小平是中美关系的主要推动者。在对美关系决策中，邓小平最有原则性，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他决不让步，甚至不惜承受中美关系倒退的风险。他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使中美关系一次又一次跨越障碍，曲折顽强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决断、方式、做法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笔宝贵财富。

女政治家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助理研究员刘福敏在《宋美龄 1942~1943 年访美：中国对美关系史上一次精彩的外交宣传》中提出：宋美龄巧妙地利用美国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成功地引导美国朝野重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推动了美国政府加强对华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宋美龄的特殊身份、个人背景、才能和美貌是此行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流

与会者对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仇华飞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生胡素萍、朱志辉提交的三篇论文通过对第一位来华创办《中国丛报》的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东吴法学院的美籍律师兰金和创立尚贤堂的传教士李佳白在华活动进行了剖析。三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在区别手段与目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美国传教士对于促进中国现代教育、新闻传媒、医疗和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美国学者与中美关系

美国学者与智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此次研讨会的内容之一。与会者集中讨论了富布赖特、奥克森伯格、鲍大可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倪峰、副研究员张立平认为：美国学者智囊对中美关系具有长期间接的独特作用，例如，富布赖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主要是举行了有助于中美关系解冻的富布赖特听证会，提出了富布赖特法案以及在中国实施 25 年的富布赖特教育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征博士还就奥克森伯格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奥克森伯格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经历进行了介绍。天津商学院教师李增田博士也介绍了有关鲍大可对中美关系贡献的研究成果。他们均认为：学者智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渐进而深远的。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和远见从特定的方面影响着社会舆论、议员和总统的决策思维，因此，学者智囊是中美关系史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更是发展中美关系过程中需要加强联系的对象。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在评价美国学者智囊对中美关系的作用时指出：在研究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一方面要肯定他们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忘记这些学者智囊是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思考中美关系这一基本出发点。

（四）中美经济交往中的历史人物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胡国成就美国经济现状与中美经济关系进行演讲。他重点介绍了中美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端、近期纺织品贸易纠纷问题，并对解决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收到有关中美经济交往与历史人物研究论文两篇，对中美合作建设



三峡水利枢纽和中美中国战时生产局合作进行了探讨。战后，中美合作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济南大学历史系张维缜教授认为，目前国内有关中美合作进行三峡开发建设历史的论述中，美国顾问萨凡奇对于三峡建设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在《萨凡奇与中美合作开发三峡》一文中，张维缜对萨凡奇在协助中国三峡开发机构工作、推动中美在工程设计、地质钻探与调查，协助中国政府与美国垦务局、马礼逊公司的签约合作等方面对中美合作开发三峡做出的贡献进行了介绍并给予了恰当的评价。西南师范大学王勇在研讨会上对纳尔逊在中国战时生产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讨论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史研究始终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有些重要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评估

经过广泛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对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具有下列特点：一是政治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经济、文化史研究欠缺，交叉学科研究不足；对人物的研究范围还要积极扩大，对于政策实施过程研究还有待加强（例如 1948 年援华法案的实施与美台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研究方法有待改进，以避免重复研究。

会上，中美关系史研究会还根据章程举行了换届选举。陶文钊连续当选为会长，吴心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副主任蔡佳禾、中山大学朱卫斌副教授三位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大学牛军教授任秘书长。

